

西方眼中的中国角色

——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

潘成鑫

西方如何看中国一直是历史学、媒体研究和文化交流的热门话题。但相对而言,国际关系领域对此关注还不多。虽然也有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对此有过独到分析,但这些并非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方向。国际关系学者通常关注比较多的是国际体系、国家利益、实力对比、权力转移、外交战略、区域整合和全球治理等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但是,对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问题的研究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认同和角色涉及观念性甚至潜意识层面,人们置身其中而不觉,所以往往视而不见。但建构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角色和身份认同将影响其利益定位,而利益定位又直接左右外交和战略定位。^① 所以,这些问题同样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

从此意义上说,探讨中国角色及其在国际安全和世界秩序中的定位就显得十分重要。正如美国的外交战略同其“美国例外论”和“天定使命论”的自我意识有着深层渊源一样,中国未来战略走向与其自身角色定位密不可分。但是,国际关系从来都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和过程,中国未来战略走向乃至角色定位并非完全由中国自己所决定,它还受到西方及其他国家对华政策的影响,而西方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对中国的定位。所以,中国学者内部探讨怎么定位中国角色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忽视西方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从长远来看,中国应对西方不仅包括政策和制度层面,还应包括话语定位层面,只有了解西方是如何看待中国尤其是看待中国崛起,我们在谈论中国的战略应对时或许才能更加有的放矢。

* 潘成鑫: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2012年)。

①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一、西方看中国与看自己

无论是看待中国或是其他非西方国家和文化,西方似乎有一种相对固定范式,即自我与他者(self/other)的二元对立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中国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出现的。当然,这里的自我和他者并非两个先天存在的客观实体,更不是两个先天对立、互相排斥的实体,作为对立面的存在,它们是在话语层面上相互构建的结果。所以,西方怎么看待中国这一他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对自我的认同和构建。那么西方对其自我是如何理解的呢?

总的来说,西方是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产物。随着启蒙运动和西方现代理性的兴起,现代人(modern man)应运而生。理性的现代人可以通过其对自然界的认知而摆脱并控制自然,实现科技、社会和历史的进步。^①这一理性的认知主体就是西方自我理解的一个原型和参照物,西方的种种自我构建最终都与此基本的自我定位密切相关,它的自我认同暗示着西方所谓的理性诉求和普世性特征。作为现代理性认知主体的化身,西方自然把追求确定性和客观知识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同时,西方把自身发展的历史作为客观确定性和普世性的发现和彰显过程,于是其自身历史便成为西方衡量和看待似乎不确定的他者的重要参照系。通过这一参照系,他者的两面性被突显出来。一方面,顾名思义,他者有别于西方自我;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对自我普世性确信不疑,他者又被认为终将与西方融合,可谓殊途同归。

西方正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思维框架,把崛起的中国看作一个不确定性的他者。在确信中国将与西方殊途同归时,西方又存在至少两种即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现实主义对西方自身发展史的解读是强权政治和势力均衡,他们把历史上这些特定的国际关系规则和模式作为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②认为中国也必然会重蹈覆辙,于是就有了“中国威胁论”。这一论调与其说是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客观描述,不如说是西方对自身历史的写照。米尔斯海默认为:“基于显然的战略原因,正如在19世纪美国在西半球的所作所为一样,中国将肯定寻求地区霸权……我们也可以预言中国将发展她自己针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就像美国对外来大国宣称它们不可插手西半球一样,中国也将明确表示不能接受美国对亚洲的干涉。”^③由此可见,米尔斯海默对“中国威胁”的担心及对中国国际战略的理解并没有超出他对美国自身历史的理解。同样,很多学者对中国可能重蹈纳粹德国的恐惧也是

^① Robert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7.

^② 例如,摩根索和吉尔平都认为,国家间为自我利益的相互争斗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客观事实。

^③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p. 401.

基于他们对欧洲历史普世性的判断。

与现实主义者不同,自由主义学者对西方自我的理解着眼于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和资本主义等自由价值观念。例如,在自由主义者眼中,美国是“山颠之城”、“民主灯塔”、“自由圣地”和“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欧洲则自封为“规范性力量”、“地区整合的楷模”等等。自由主义者同样认为中国“将会变得像我们一样”。不过,中国的殊途同归带来的将更多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尤其是比较乐观的自由主义观察者,他们出于对西方自身普世性的信心,相信或希望中国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员,为西方提供广阔的市场。在政治和国际制度层面上,一些乐观派认为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中国将成为国际秩序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并随着中国的民主化,终将与西方融为一体,促成“历史的终结”。^①

尽管“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看似大相径庭,其实二者是一副看待中国的双焦镜。从根本上讲,这些关于中国的表述都是基于西方对自身角色和定位的理解。针对“中国威胁论”,中国经常批评西方是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其实冷战过去都20多年了,再都归结到冷战思维上似乎有些牵强。事实上,冷战思维的根源其实就是西方对自我和他者的这种二元认识。

二、中国的国际角色和战略应对

谈论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定位,我们无法回避西方对中国的上述话语构建。从某种程度上讲,为什么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得不到其应有的尊重,以及为什么中国对其地区的经济贡献远远超过美国却反而丧失其地区战略影响等问题也可以从中找到答案,^②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塑造和影响。西方的塑造首先影响西方对华政策,进而影响中国的战略回应和角色认同。比如,在西方认为中国是机遇并推行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前提下,中国更容易接受现行的国际秩序并愿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同样,在回应西方对中国威胁的担忧时,中国也曾试图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并提出诸如“和平崛起”及“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③另外,由于西方在国际话语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和行为主体对

^① 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NBR Analysis*, Vol. 16, No. 4, 2005, pp. 5-14;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② Zhu Feng, *U. S. Rebalancing in the Asia-Pacific: China's Response and the Future Regional Order*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No. 12),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2012, p. 15.

^③ Chengxin Pan, “‘Peaceful Rise’ and China's New International Contract: The State in Change in Transnational Society,” in Linda Chelan Li ed., *The Chinese State in Transition: Processes and Contests in Local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127-44.

中国的看法和定位。这说明中国的角色定位不仅是一个中国自身需要解决和厘清的学术文化问题,而且是一个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密不可分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国是什么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什么,同时也取决于西方怎么看待和对待中国。

当然,西方怎么看待和对待中国取决于中国怎么看自己和处理对外关系。所以,从此意义上讲,中国可以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声音和行为影响西方乃至世界对中国的定位。但是,如前所述,由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由中国的所谓“客观现实”所左右,而是深受西方自我定位的影响,那么,中国应该清楚,通过自己努力和改变西方关于中国的观念可能收效甚微。只要西方对自我看法不改变,其对中国认知就很难动摇。这也许是什么尽管中国的人权状况已有明显改善,但西方仍然坚信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不断恶化。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使中国一方面放弃那种相信西方将会接纳中国的幻想,另一方面,也避免把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当作“阴谋论”。

面对西方对中国的话语构建,中国究竟应该如何自我定位和进行战略调整?

第一,创新发展模式。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以改变自己的方式来改变世界的,^①现在同样也不例外。无论西方和世界怎么看中国,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中国的真正崛起需要在发展模式上另辟蹊径。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继续沿用西方工业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比如继续严重依赖石油等化石能源,那么国际竞争将不可避免,因为这类资源终归是有限的。在战术上中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而以减少对世界减排的责任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战略上,中国不能满足于此,而必须更加积极地寻求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从历史上看,英国的崛起是从发现煤开始,美国崛起跟石油相关,那么中国或许也要靠一种新的能源来给自己寻找一种新的崛起空间,尽管这种发展转型任重而道远。

第二,更加积极地向周边国家和中等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对周边国家和中等国家的外交,说到底是一种大国外交。如果大部分周边国家能够比较认同中国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战略构想,那么,中国在与美国等大国的外交中就会更加主动。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具有积极意义,是一种“安邻外交”。^②但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和平发展”战略还需要丰富和强化。这是因为仅仅强调中国和平、不搞霸权还不够,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安邻”。中国还应该积极地给其他国家提供更实际的公共产品,诸如安全承诺、市场开放、经济援助等,以建立长期信任。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做法就是更为积极的“安邻”外交,在其后

^① 章百家:《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② Jia Qingguo,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s Policy of Reassur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9, No. 4, 2005, pp. 493-508.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都博得东亚地区的赞誉。现在在欧洲债务危机和地区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机遇。

第三,加强地区认同建设和深入开展公共外交。美国的世界霸权不仅仅是依靠国内生产总值和坚船利炮。1949年,针对苏联共产主义对世界很多国家的强大吸引力,艾奇逊的远东顾问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发现,美国只强调自己反对什么还远远不够,他提出,美国必须解决“我们代表什么?”(What are we for?)的问题。这一反思使得美国开始重视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来树立美国在世人心中的正面形象。^①正是那种可以在世界很多地方引起共鸣的美国梦,使美国的软实力波及全球,同样,中国的真正崛起应该也是在软实力方面崛起。

第四,重视话语权问题。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民主、人权、人道主义干涉、无赖国家、恐怖主义、种族屠杀、负责任大国等定义几乎无不来自西方,这些话语权上的优势使西方尤其是美国往往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认识到话语权层面上的国际关系较量后,中国学者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在西方关于中国的一些主流话语方面(比如关于“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强势外交”、“中国不透明”、“中国人权”)作出自己的回应,从而在西方对中国的定位上有自己的声音。当然,话语权不等于喊口号,其建立和巩固离不开国际体制和制度的支持。所以,中国还需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体制和制度的建设。

总之,中国的角色定位问题及在此问题上的西方话语优势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是一个我们思考中国国际战略走向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①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38.